

【史海钩沉】

# 『人面桃花』背后的晚唐记事者

## 孟启与《本事诗》：



诗》一书。

“本事”一词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意为原本事实。“本事诗”，即记载诗歌的创作背景、缘起与相关轶事，也就是“诗本事”。孟启在自序中阐明编撰动机：诗歌本是“触事兴咏”的产物，若失去背景的“发挥”，则难“明厥义”。因此，他广泛采摭，“事须真雅”，刻意排除了“异传怪录，疑非是实”及“拙俗鄙俚”的内容。孟启《本事诗》共收录四十一则故事，分为情感、事感、高逸、征异、征咎、怨愤、嘲戏七类，除两则南朝时期故事外，其余皆为唐代诗人轶事和民间故事。在书中，孟启开创了“以诗系事”的体例，将诗歌创作与背后故事紧密结合。这一体例直接影响了宋代诗话的创作。

《本事诗》一书，虽故事数量不多、篇幅不长，但大多数篇章几乎耳熟能详。除崔护“人面桃花”故事外，还有贺知章“金龟换酒”的故事、顾况红叶题诗的传说、王维赋诗《息夫人》、刘禹锡“司空见惯”轶事等，涉及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、刘禹锡、骆宾王、杜牧等诸多著名诗人。书中所载内容，或源自正史中记载极为简略者，或取自笔记小说与民间传闻中失之本真者，经过孟启的加工与创作，部分内容与史料虽有一定偏差，却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诗歌背后的人与事，让诗人的形象更加鲜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孟启首创“诗史”之说。在《本事诗·高逸第三》中，孟启评价杜甫：“杜逢禄山之难，流离陇蜀，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。”这是目前可见文献中，首次明确将杜甫诗歌与“诗史”这一经典称谓联系起来的记载，直接影响了后世对杜诗的认识与评价，对杜甫诗学地位的奠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孟启所理解的“诗史”，侧重于诗歌对个人流离经历与日常生活的详尽记述，强调其叙事性与纪实性。

孟启开创的“以诗系事”体例，实际上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——“本事批评”。它将诗歌解读从单纯的文本分析，扩展到创作背景、传播过程与社会互动，为理解诗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语境。这一范式直接启发了宋代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，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等一系列诗话、纪事体著作的诞生，成为后世研究唐诗不可或缺的路径。

生于晚唐的孟启，虽未能像李白、杜甫那样以诗名耀千古，也未能位极人臣，但其创作的《本事诗》，却让我们通过这些“诗本事”，重新回到诗歌创作的历史现场，更加深入地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，真正感受到他在自序中所云“诗者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《本事诗》巧妙地在诗歌与历史、文人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唐诗诞生时的场景。当我们在每一个春天吟咏“人面桃花”时，不应忘记，是千年前那位名叫孟启的记录者，用他的笔墨，为我们定格了这场穿越千年的美丽邂逅，也保存了一个时代最生动的记忆。

### 【故地往事】

## 明代官箴碑的齐鲁渊源与四百年流变

□孙晓明

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众多名碑之中，有一通与泰安息息相关的三十六字官箴碑。碑文不过寥寥数语：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读来字字铿锵，令人肃然起敬。这样一则被誉为“居官之要领”的千古箴言，究竟从何而来？它为何与千里之外的泰安结下不解之缘？又是谁在残壁断垣中将其救出，让它穿越四百年风雨重见天日？要解开这些谜团，还需从明初理学家曹端与弟子的随口问答说起。

源头：

### 曹端首倡“公廉”之训

这则三十六字官箴的精神根脉，要追溯到明初理学家曹端。曹端是河南浞池人，明永乐六年考中举人，一生潜心性理之学，治学极重躬行实践。史书记载，他坐在案前研读，脚下砖石竟被磨出两个深坑，可见用功之深。

曹端后来出任霍州学正，“修明圣学”，当地民风为之大变。新任西安知府郭晟是他的学生，赴任前专程登门求教为官之道。曹端只说了两句话：“其公廉乎！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”郭晟谨记在心，日后为官果然以“公廉”著称，还将这则箴言刻石自警。虽然郭晟的碑石早已湮没无存，但“公廉”二字作为官箴的核心意蕴，由此扎根流传。

接续：

### 年富巡抚山东续六字

比曹端晚生十九年的年富，让这则箴言发生了关键性演变。年富是安徽怀远人，二十岁出头便出任山东德平县训导，年纪虽轻却十分稳重。他性格刚正，遇事果敢，在朝野声名甚重。

诗作《祷雪》：“名尊五岳镇山东，至圣惟可化育功。一炷信香烟感召，愿垂三白兆年丰。”字里行间流露着体恤民生的拳拳之心。正是借这次考察之机，三十六字官箴首次传入泰安州衙。

刻石：

### 顾景祥泰安首立官箴碑

最早将官箴镌刻于碑石且有明确记载的，是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。顾景祥是南直隶长洲人，弘治年间出任泰安知州，为官清正，政绩斐然。他非常欣赏年富当年刊行的三十六字箴言，认为言简意赅、意蕴周全，遂于弘治十四年秋八月，将这段箴言刻碑立于泰安州署，自称“重刊亦以自傲”。

这方泰安官箴碑的跋文明白白地写道：“右箴言简而意甚周，昔年恭定公抚治东藩时，尝刊行以儆于有位者，今贞庵主人乃重刊亦以自傲。”跋中的“年恭定公”正是年富，“抚治东藩”即巡抚山东。此时距年富去世已有三十七年。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泰安官箴碑。

遗憾的是，顾景祥所刻的这方碑石早已无存。我们今天能够确知其形制与流传经过，皆因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另一方官箴碑留下了珍贵记录。

重刻：

### 颜希深残壁发现续文脉

泰安官箴碑再次问世，要等到二百多年后的清乾隆年间。乾隆十八年，二十四岁的广东连平人颜希深擢任泰安知府。此人聪颖过人，在泰安任上颇有一番作为。他主持创建泰安试院，让更多士子得以就近应试；积极倡办书院，惠及一方子弟；还严格清查漕粮征收中的种种弊端，深得民心。

乾隆二十三年，颜希深在衙署破旧残壁中偶然发现一方碑石，拂去尘土仔细辨认，竟是明弘治年间顾景祥所刻的官箴碑。他反复诵读那三十六字，深感“言约意深，为居官之要领”，当即依原文重刻新碑，立于署内西厢房作为座右铭，并撰写跋文记述此事。更难得的是，颜希深将这则官箴定为家训，规定后世子孙凡从政者均须携此箴言赴任。

颜希深后来官至湖南巡抚、兵部侍郎、云南巡抚，一生“以诚事君，以德及民，以廉驭属”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颜氏三代历仕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四朝，子孙多官至总督、巡抚。广东连平颜氏逐渐发展成为“一门三世四督抚，五部十省八花翎”的显赫世家。

颜希深之子颜检，之孙颜伯焘均将官箴碑辗转刊刻于任职之地，三十六字箴言由此从齐鲁播向江南、传至全国。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那方官箴碑，正是颜伯焘于道光年间委托长安县令张聪贤刻成的。

回望这三十六字官箴的四百年流变史，泰安始终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。从年富巡抚山东时传入泰安州衙，到顾景祥首刻官箴碑于泰安署内，再到颜希深在泰安残壁中发现旧碑、重刻传世，泰安不仅是这则箴言的重要传播节点，更是使其从历史尘烟中重获新生的关键之地。

（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明正统年间，年富以山东巡抚身份视察齐鲁各地。他久仰曹端官箴之名，得到这则箴言后反复揣摩，觉得意犹未尽，便在曹端对学生郭晟的答语基础上进一步创作，三十六字官箴由此定型，境界为之一新。年富不仅将其恭敬书写，悬挂于衙署，还主动刊印传播，勉励下属官吏各守其道。

年富巡抚山东时曾到泰安、泰山考察，《岱史》中收录了他的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